

# 厦门石刻撷珍

何丙仲 著

是中华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它是与中华文明发展史同步的。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利用石头来记录生活和生产。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字的出现，石刻的内容与形式也越来越丰富多彩。到了汉代，石刻已经走向成熟或发展的阶段。唐代是中国石刻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各种石刻艺术形式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宋代以后，石刻艺术继续发展，内容更加广泛，形式也更加多样。石刻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具有实用价值。它不仅是记录历史、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研究社会、了解民情的宝贵资料。在厦门，石刻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古代的摩崖石刻到近代的石碑，无不体现了厦门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本书精选了厦门各地的石刻精品，通过精美的图片和详细的文字介绍，向读者展示厦门石刻艺术的风采。希望本书能为读者了解厦门石刻艺术提供有益的参考，也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积极的贡献。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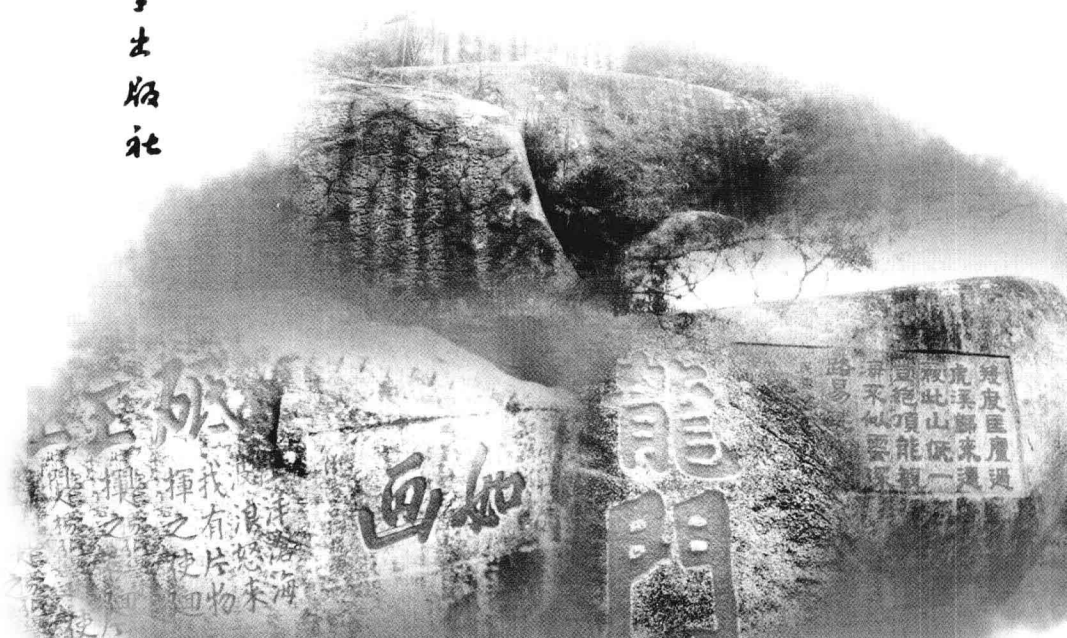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厦门市委员会 编

何丙仲 著

# 厦门石刻撷珍

厦门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厦门石刻撷珍/何丙仲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1. 12

(厦门文史丛书)

ISBN 978-7-5615-4165-4

I. ①厦… II. ①何… III. ①石刻-厦门市 IV. ①K87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7964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 @ public. xm. fj. cn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5 插页:3

字数:260 千字 印数:1~2 000 册

定价:5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 《厦门文史丛书》编委会

■顾 问 陈修茂 陈炳发 陈耀中 徐 模 江曙霞  
魏 刚 陈昌生 黄世忠 陈维钦 陈联合  
庄 威 桂其明 翁云雷

■主 任 魏 刚

■副主任 朱伟革 何秀珍

■主 编 洪卜仁

■编 委 董金英 沈松宝 卢怡恬 张昭春 徐 艳

### 《厦门石刻撷珍》

■著 者 何丙仲

## 【序言】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古往今来，人们总是由衷地赞美春天。因为她充满生机和憧憬，带来的不仅仅是播种的愉悦，还常常伴随着收获的希冀。

在万木复苏、百花盛开、姹紫嫣红、春回大地的日子里，参加厦门市政协十一届一次全会的全体新老政协委员，就是怀着一种播种与收获交织、愉悦与希冀并行的激情，迎来了2007年新春的第一份礼物。根据本届市政协主席会议的研究决定，由厦门市政协与我市文史工作者合作共同推出的“厦门文史丛书”“第一方阵”——《厦门名人故居》、《厦门电影百年》、《厦门史地丛谈》、《厦门音乐名家》等四种政协文史资料读物终于如期与大家见面了！

这无论在厦门政协文史资料发展历史上、还是在我市先进文化建设进程中，都是可圈可点、很有意义的一件喜事。为此，我首先代表厦门市政协，向直接、间接参与这套“丛书”的组织、策划、编撰、编辑、出版和宣传工作而付出辛勤劳动的有关领导、专家、学者及工作人员，向为此提供宝贵支持的社会各界和热心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新春佳节最美好的祝愿！

众所周知，文史资料历来就受到人们的重视和青睐。因为通过它，人们不仅可以自由地超越时空，便捷可靠地了解到一个区域（通常是一个城市）古往今来的进步发展情况，真实形象地感受到这里丰富多彩的文化历史现象，满足自己的求知欲和审美情趣，而且还可以发现许多具有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的

吉光片羽，并从中汲取激励自己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养分和力量。

通过文史资料，我们知道：厦门这块热土有着丰富而厚重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迄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厦门岛上就有早期人类生活的遗迹。大概一千二百年前的唐代中叶，中原汉族就辗转迁徙前来厦门，在岛上拓荒垦殖、繁衍生息。宋元时期，中央政府开始在厦门驻军设防。明朝初年，为了防御倭寇侵犯，在厦门设置永宁卫中、左二所，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又在此兴建城堡，命名厦门城。从此，“厦门”的名字正式出现在祖国的版图上，并随着城市的进步发展、知名度的不断提高而逐渐蜚声海内外。今天的厦门，早已不是当年偏僻荒凉的海岛小渔村，而是国内外出名的经济特区、现代化国际性港口风景旅游城市。

通过文史资料，我们还知道：千百年来，依托厦门这方独特的历史舞台，勤劳勇敢、聪明善良的厦门人民，在改造自然与社会、追求进步与发展、争取生存与自由、向往幸福与独立的伟大进程中，谱写了一曲曲感动天地的赞歌，创造了一个个令人惊叹的奇迹，同时也涌现了一批批彪炳青史的俊彦。如以厦门为基地，在当地子弟兵的支持下，民族英雄郑成功完成了跨海东征、收复台湾的辉煌壮举；在其前后，有发明创造“水运仪象台”，被誉为“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科学家之一”的苏颂；有忠勇爱民、抗击外敌，不惜以死殉国的抗英爱国将领陈化成；有爱国爱乡、倾资办学，不愧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著名侨领陈嘉庚；有国家领导人方毅、叶飞，一代名医林巧稚、著名科学家卢嘉锡等等。他们的传奇人生、奋斗业绩所折射出的革命传统、斗争精神、民族气节、高尚情操和优秀秉性，经过后人总结升华并赋予时代精神，已成为厦门人民弥足珍惜、继承光大的精神财富，正激励着一代代的厦门儿女为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

春风化雨，任重道远。通过文史资料，我们更是知道：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我们的家乡厦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这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历史性巨变，不仅体现在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生活改善、社会进步等方面，还突出表现在广大人民群众思想观念、道德情操、精神面貌、文明素质等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追根溯源，可以明志兴业。利用人民政协社会联系面广、专业人才荟萃、智力资源集中的优势，通过编撰出版地方文史资料，充分发挥政协文

史资料“团结、育人、存史、资政”的功能，这本身就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重要方式之一。值此四种文史资料的诞生，在充分肯定厦门发生的历史巨变而倍感自豪的同时，我们要一如既往地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视察福建、厦门海沧台商投资区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纪念厦门经济特区 25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致力于厦门经济特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的同时，从加强特区先进文化建设的高度，进一步加强政协文史工作，充分发挥政协文史资料的功能，以“厦门文史丛书”的启动为契机，严肃认真、兢兢业业地继续做好这项有意义的工作，以不负时代的重托。

我相信，有我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的重视参与，有社会各界的支持帮助，有多年来积累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特别是有一支经受考验锻炼、与海内外各界联系广泛、治学严谨的地方文史专家队伍，只要我们认准目标、锲而不舍，与气势如虹的我市新一轮跨越式发展相称，与方兴未艾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呼应，作为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要事业，我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一定会取得长足进步，推出更多精品，发挥更大的作用！

城市历史文化，从来是反映城市前进发展中经验与教训的真实记录，是人们在改造自然与社会、创造“三个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所留下的重要印记、所提炼的不朽灵魂。以履行政协职能为宗旨，以政协编辑出版的地方文史资料为载体，通过有选择、有重点地记录、反映一座城市（或者相关的一个区域）的历史文化，自觉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为科学发展服务，为构建和谐文化、和谐社会服务，为祖国统一大业服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这正是政协文史工作及其相关的文史资料的长处和作用，也是它区别于一般地方文史资料最重要的特色和优势。

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和共识，在厦门市政协党组的高度重视和倾力支持下，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宣传委员会认真总结近年来编纂出版地方政协文史资料的成功经验，在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我市有关社会机构和各界人士的帮助下，组织了本市一批有眼光、有经验、有热情、有学识的地方文史专家和专业工作者，经过深思熟虑、反复论证，决定与国家“十一五”计划同步，从 2006 年起，采取“量力而行、每年数册”的方针，利用数年时间，出齐一套大型地方历史文献“厦门文史丛书”。

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是，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在批判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努力挖掘、整理、利用厦门地方历史文化渊源中有益、



有用、健康、进步的或者具有借鉴、警示意义的文史资料，直接为现实服务；为地方历史文物的保护工作服务；为地方文史资料的大众普及和学术研究工作服务；为发挥政协文史资料“团结、育人、存史、资政”的作用服务；为人民政协事业服务；为统一战线工作服务；为遍布海内外，通过寻根问祖，关心了解祖国和家乡过去、现在、将来的厦门籍乡亲服务；为主张两岸交流，认同“一个中国”，心系祖国统一大业的炎黄子孙服务；为提高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科学文化素质、道德文明修养，培养“四有”公民，建设学习型、创新型社会，推动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实现“更好更快”发展的新目标提供方向保证、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服务。

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方针是，不求全责备、面面俱到，只求真实准确、形象生动。即经过文史专家的爬梳剔抉、斟酌考证，尽量选取第一手的“原生态”史料，从本市及其邻近相关区域中所传承积淀下来的文化历史切入，以厦门市为重心、适当延伸至闽南地区，以近现代为主、当代为辅，以厦门城市发展进程中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人物事件为对象，通过“由近及远、由表及里、标本兼顾、源流并述”的方式，尽可能采取可读性强的写法、并辅之于可以说明问题的历史照片或画面，进行客观而传神的艺术再现。

我在本文的开头特别提到，春天是充满希望与憧憬的时节。反复揣摩案头上还散发着阵阵醉人的油墨芳香近日常见的四种政协文史资料读物，欣喜之余，我想到，虽然这仅仅只是成功的开篇，今后几年里厦门政协文史工作要取得预期的成果，顺利出齐“厦门文史丛书”全部读物的任务还相当繁重，但我坚信，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政协“团结、民主”的主题，相信和依靠大家的智慧力量，始终秉持春天一样的热情与锐气，始终把希望和憧憬作为自己前进的目标、动力，一如既往地追求奋斗，我们的事业将永远充满阳光、和谐！

是为序。

陈修茂

（作者系厦门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2007年2月28日



## 【前言】

石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它是与中华文明发展史关系最密切的一种文物。早在远古时代，中国大地已有着许多岩画。先秦时期，汉文字的石刻已开始出现。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字的发展，石刻的内容与形式也越来越丰富多彩。到了汉魏时期，摩崖石刻和各种碑刻、墓志基本上已经走向成熟或发展的阶段。唐代是中国石刻文化最为辉煌的时期。宋元以后，石刻文化进一步遍及民间社会，其内容之广泛，形式之多样化，使之成为一门融入社会而备受各界重视的文化。时至各种媒介发达的今日，凡有要事，国人仍然以勒石为记。在所有文物的门类中，像石刻这样既具有考古、文献价值，又具有文学和书法艺术价值，而且具有实用价值的文物，实不多见。以目前之所知，世界上唯有我们中国有这样博大精深的石刻文化。就国内各种文化遗产中，像石刻文化具备这么多的价值功能者并不多。因此，称石刻为“国粹”，并不为过。

厦门是一个石刻文物的蕴藏量相当丰富的地方。在许多风景名胜景点，如南普陀、日光岩和万石山等处，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遍布其中的各种摩崖石刻。在同安孔庙、青礁慈济宫和南普陀寺，乃至有祠堂庙宇的地方，都可以观赏到内容丰富、书法精美的历代碑刻。近年来，随着厦门城市建设的发展，考古工作者还发掘出唐代的墓志铭。可以说，厦门自晚唐开发以来，石刻文化就与其发展的步伐形影相随。它不但是风景旅游区的点缀，还是厦门城市发展的见证。如果把这些林林总总的

石刻文物归聚起来，完全可以把厦门 1000 多年来的文脉梳理出来。

可惜由于年代久远，有些重要的石刻已经毁佚。譬如从前矗立在鹭江道海边的“打石字”，是在近代什么时候消失的，至今还是一个谜。尽管如此，历劫遗留下来的各种类型的石刻数量依然不少。经过搜集整理后，发现除掉一部分坟山地界和“风水石”等标志性石刻，厦门地区共有摩崖石刻 456 段，其中 413 段分布在原来厦门市的老城区——思明区（鼓浪屿 69 段），其年份主要为明、清两个朝代和民国时期。其中有年款可查的石刻共有 412 段，包括明代 69 段，清代 218 段，民国时期 125 段。岛内年代最早的摩崖石刻是云顶岩上的“天际”两字。

碑刻的命运也和摩崖石刻差不多，不少碑刻现在仅能从方志文献里找到记载。像海沧那通记载明代名宦周起元的《侍御绵贞周公功德碑记》和湖里那通记载郑成功部将甘辉的《颂崇明伯甘老爷功德碑》，时至今日，原碑虽在，但除了碑题，已没多少个字可查了。就目前所见的实物进行统计，厦门现存有从宋代至民国时期的大小碑刻 382 通（可能还会有个别被遗漏），包括宋、元、明、清几个朝代，以及民国时期。其中以清代最多，共 289 通。年代最早的宋代碑刻都在岛外，它们有建隆四年（963 年）的《建造太师桥题刻》、治平二年（1065 年）的《海沧石室院石构建题刻》、开禧乙丑（1205 年）同安铜钵岩的《石佛造像记》、景定元年（1260 年）同安区新墟的《古道十八弯修路石刻》，但这些石刻大多是建筑物石构件上镌刻的文字。比较正规的碑刻，其年代最早只能追溯到明代，最早的有天顺二年（1458 年）海沧后井的《旌义民碑》、弘治甲寅（1494 年）同安的《宋理学先贤顺之许先生墓道碑》、弘治庚申（1500 年）灌口田头的《万寿宫题缘碑》、嘉靖二十五年（1546 年）马銮的《杜氏复业碑》和嘉靖四十三年（1564 年）同安岳口的《邑父母谭公功德碑》。厦门现存的这些碑刻文物，主要有铭功纪念、社会建置、教育机构和官廨、宗教寺院、宫庙殿宇、宗祠家庙、示禁乡规等几个大类，基本上涵盖了明清以来厦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墓志的数量难以做准确的统计。据考古发掘，厦门近年一次性出土了两方唐代的墓志铭。目前发现的宋元时期墓志的数量还很少，明清两代相对较多，这种现象与厦门开发发展的进程是一致的。由于墓志记载墓主的生平相对翔实，涉及的社会环境也比较客观，因而是研究地方历史文化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厦门的石刻无论在形式或内容方面，都体现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色，

同时又充满着闽南这一方水土的特质。而这种特质又是其他地方无法取代的。这就是厦门石刻文化魅力之所在。

厦门石刻文化有以下几个地域特色：

一是反映古代厦门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文物见证。明代中后期以后，随着闽南沿海海商贸易的兴起，厦门面临着倭患和西方殖民势力的骚扰。厦门军民奋勇作战，打败强敌，保卫了家园。现存的《征倭诸将诗壁》、《俞戚诗壁》和三处的《攻剿红夷石刻》，以及这些将领的多处摩崖诗刻，为这些爱国事迹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见证。类似这一批能够反映中国人民抵御外侮的石刻文物，在国内实属首见。

二是反映海峡两岸“五缘”关系的重要见证。郑成功是海峡两岸共同敬仰的历史人物，厦门有为数众多郑成功及其部属的摩崖石刻、碑刻和墓志铭，还有不少后人缅怀这位民族英雄的石刻。此外，清代有关厦台关系的石刻为数甚多，其中典型文物有康熙朝的《澎湖阵亡将士之灵》石刻、乾隆朝反映两岸对渡的《重修五通路亭碑》和石国球等台湾同胞的题刻。有清一代，台湾属于驻守厦门的福建水师提督管辖范围，陈昂、吴英、蓝可斋、蒲立勋、陈化成、邱联恩、陈宗凯等水师将领留下来的各种石刻文物，内容多与台海风云有关。清代后期涉台的摩崖石刻和墓志更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易顺鼎反对“乙未割台”的题刻、李友邦的“复疆”题刻。记载厦台两地民间活动的墓志，以及镌刻台胞捐款参与修葺宗祠寺庙的碑记，更是不胜枚举。如记载台湾第一位举人的《苏巍庵夫妻合葬墓志铭》，记述台湾“板桥林家”林维源、林彭寿生平的墓志等等，都是体现闽厦两地关系的重要证据。

三是反映厦门与南洋华侨关系的珍贵史料。厦门人漂洋过海的历史源远流长，“服贾海外”的碑铭记载同样不少。从现存的碑刻来看，早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就有厦门人在“吧国”（今印尼）担任“甲必丹”（Kapitein）、“雷珍兰”（Luitenant）和“美硕甘”（Weeskamer）等华侨首领的记载。他们身在异国却心存故乡，多次为龙池岩寺和青礁慈济宫的修建捐款。华侨为祖籍地乐捐善款，已成为优良传统，这些都在厦门的碑刻上得到充分的体现。清末民初，墓志的形式日渐式微，而厦门的华侨或侨眷仍然延续这种文化传统。印尼华侨黄奕住、吴奕聪、王玉深和缅甸华侨陈茉莉等人的墓志，丰富了华侨史研究的内容。

石刻文物还具有证史、补史的重要作用，厦门的石刻也不例外。比如近年来出土的唐代墓志，就为厦门古代开发史的探讨展示了不少新的视野。

此外，某些地方人物生平的点点滴滴，也可以从相关的石刻文物中找到印证。不仅如此，石刻文物还为我们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如此前社会上一直认为古代厦门属于同安县管辖，但是清代厦门岛内官府的所有各类示禁石刻，却没有一通是以“同安县知县”或“知同安县事”结衔颁布，而无一例外都是以“泉州府海防同知”或“厦门海防分府”公布的。这说明什么问题？类似这些问题值得学术界文史同道的重视。

今天，我们编辑出版这部有关厦门石刻文物的书，目的就在于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厦门的石刻文化遗产，并对它发生兴趣，从而共同携起手来爱护它。

谨以此书，向厦门经济特区成立 30 周年献礼！

编者

2011 年 12 月

| 厦 | 门 | 石 | 刻 | 撷 | 珍 |

## 目录

|               |  |
|---------------|--|
| 绪论 / 1        |  |
| 登山越岭赏明诗 / 38  |  |
| 征倭剿夷豪气在 / 55  |  |
| 风流千载忆延平 / 67  |  |
| 云洲诗味待重寻 / 82  |  |
| 石刻犹存台厦情 / 106 |  |
| 扫苔剔藓觅屐痕 / 121 |  |
| 美舰访厦续余篇 / 129 |  |
| 清代武将题刻多 / 140 |  |

|                 |  |
|-----------------|--|
| 名利曾经作“客厅” / 148 |  |
| 僧人中彩修寺庙 / 159   |  |
| 鹭门仙佛用“番银” / 164 |  |
| 巍然片石阅沧桑 / 173   |  |
| 郑彩原是厦门人 / 179   |  |
| 且寄道心与明月 / 185   |  |
| 同安名宦有美文 / 190   |  |
| 雅称浑号识民风 / 196   |  |
| 踏遍浯洲寻石刻 / 203   |  |

|           |  |
|-----------|--|
| 后 记 / 222 |  |
|-----------|--|



## 绪论

通常，我们对石刻并没有很严格的界定。从广义上说，凡在石头上雕刻的东西，都可称之为石刻。但从事文物工作的人看来，利用石头本身所进行的造型艺术创作，应称之为石雕（或称“造像”。如在石头表面上以单线条刻划的平面形象，则又称为“画像石”）。只有在石头的表面上雕刻文字，才是石刻。清代金石家叶昌炽认为：“凡刻石之文皆谓之碑。”<sup>〔1〕</sup>叶氏对“碑”的释义，实际上已给石刻和石雕作了界定，根本的区别就在于石头的平面有无文字。文物界在长期实践中，通常又将历史遗存下来的石刻分为：在天然石头的平面上雕刻文字的摩崖石刻，和在加工过的石材平面上镌刻文字的碑、碣和墓志等几个门类。摩崖石刻是属于不可移动的文物，而碑刻和已出土的墓志则否。但这些石头的表面上都镌刻着文字，因此它们总称为石刻。

本书所述及的对象，即指在厦门行政区划以内，以及历史上曾经辖属于厦门同安县的部分地区所保留至今的摩崖石刻、碑刻和墓志。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保存着如此丰富，而且具有历史、文学和艺术等方面价值的石刻文物。

远古时期，石头不但是人类的劳动工具和日常用品，同时也是最早的



雕刻材料。古人不但懂得利用石头雕凿出具象的作品，还能够在岩石上磨刻和涂画某些符号，来描绘他们的生活，以及其想象和愿望。于是，在文字还没有产生之前，人类已经在岩石上面雕刻了岩画。中国是古代岩画分布较为集中的国家之一。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象形文字出现了。人类使用的文字皆从象形文字衍化而成。西亚的两河流域和古埃及等地的文化遗存，与新石器时代我国仰韶文化的陶器上面，都有由各种刻划符号演化而成的象形文字。然而，经过长期的使用与发展，中西方在文字发展的轨道上越走越远。唯独我国的汉字沿着象形表意这一文化模式，走过从陶刻符号到甲骨文、金文、秦篆、汉隶，乃至汉字最后成熟的发展历程，成为既是思想交流的工具，同时又是艺术审美的载体。而西方国家的文字则走向表音而不象形、偏重于实用功能的发展道路。

中国的石刻文字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载体之一，同时也体现着汉字演变、发展的全部过程。由于石刻蕴含着那么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学和书法、艺术的文化内涵，其自身的发展又如此源远流长而有规律，又如此有机地融入本民族文化的肌理之中，因而石刻本身形成的那种独特的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项瑰宝。

近年来，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石刻文化，“其历史之悠久，精华之荟萃，品种之繁茂，书法之高妙，镌刻之精湛，史料之珍贵，内涵之丰富，涉及之广泛，功能之多样，风貌之壮观，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无法比拟的”<sup>〔2〕</sup>。《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也将石刻与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等同时列为受国家保护的文物，受到社会普遍的重视。

闽南，尤其是厦门的石刻文物不仅门类齐全，为数众多，而且颇具地方特色。闽南历史文化的许多闪光点，其实就蕴涵在石刻里面。把这些珍贵文物的文化内涵揭橥出来，让石头说话，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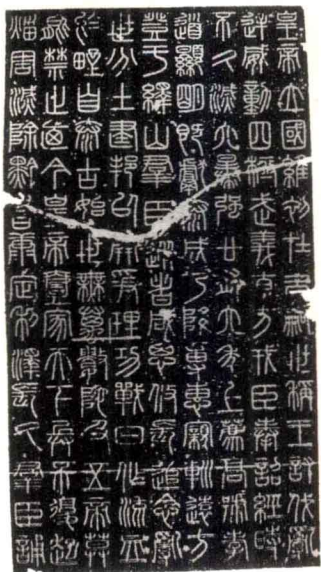
闽南，包括厦门的石刻文化源远流长，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此，我们有必要对我国的石刻文化做一个简略的回顾。



摩崖石刻起源于岩画，始见于我国先秦时期。“石刻”一词，最早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秦始皇的《峰山刻石》等一批摩崖石刻今犹存世。自秦以后，摩崖石刻历经千百年而不衰，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骚人墨客，一有机会都会在石头上留下铭功、纪游的题刻，因而海内大部分名山都有各种各样的摩崖石刻遗存。

碑刻则肇始于东汉时期。但先秦的《仪礼·聘礼》一书已出现“碑”字，该书说：“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陈。”东汉郑玄注曰：“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其材：宫庙以石，窆用木。”可见“碑”最初是宫中识日影、系牲畜之器物，又是丧葬的工具，所以东汉的某些碑的中部偏上之处还保留着一个称作“碑穿”的圆孔。东汉盛行隶书，现存有原石或拓本的碑刻共230余种。南北朝时期隶书向楷书转变，各种石刻数以万计<sup>[3]</sup>。唐以后的碑刻更是浩如烟海。两宋以后，碑刻的内容往往涉及社会生活，所以记事的碑刻偏多。除铭功纪勋或官谕示禁外，民间的造桥铺路、修祠建庙等事都会立碑为记，以垂久远。所以千百年来，遗存下来的碑刻数量简直无法准确统计。

墓志滥觞于战国时期的刻铭墓砖和东汉的刑徒墓砖，西晋时期开始定型。南北朝是墓志勃兴的时期，出土的墓志数以千计。历来全国各地陆续出土的各朝各代的墓志不知凡几。墓志以记述人事为主。其格式一般包括“首题”、“志文”和“颂辞”三个部分，内容不外是记录死者的世系里爵、生平功业、生卒时间、后嗣婚嫁以及墓葬位置等情况。墓志结尾附有“颂辞”（铭文）者为“墓志铭”。昔人为先人作墓志是很严肃的事，故所记人事相对可靠，加上墓志随死者入土后他人很难再篡改，所以一向为治史者所重。



秦·峰山刻石



汉·史晨碑

摩崖石刻和碑刻的书体在汉代以隶书为主，六朝以后主要以楷书为主，四体兼备。而墓志基本上都以楷书“书丹”，其“首题”则多以篆书“篆额”，既保存古风，也有装饰的作用。

石刻，不仅可以用来作为研究、学习书法艺术的范本，其内容文字还是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因此，目前石刻学（旧称金石学）已成了一门显学。



西晋·管氏夫人墓碑并阴

### 三

福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两晋时期，中原文化始随着士民的南渐而在八闽大地传播。唐代早期，闽南的漳、泉两地已分别于垂拱二年（686年）和景云二年（711年）建州设郡。传统的石刻文化从唐代起在闽南地区生根发芽。闽南到处都有花岗岩，为石刻文化在当地的发展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也形成了其有别于北方石刻的地方特色。

早在遥远的古代，居住在闽南的先民便在石头上雕凿类似文字的“仙篆”。漳州的“仙字潭摩崖石刻”似字似画，形状奇特。这些刻划符号现保存在华安县汰溪边的崖壁上，分布范围约200平方米，现有50多个符号，至今犹未有人能够识读。但学术界基本上都断定它是先秦之物。从先秦到



先秦·华安仙字潭石刻

初唐，闽南地表上的石刻文物很少。尽管闽南地区现有若干座这段时期的古墓葬，如南安狮子山和泉州池店的东晋和南朝墓、惠安土寨的隋墓等，然而所出土的均为纪年砖，而无墓碑或墓志。南安丰州西晋纪年砖年代最早，上有“太康五年（284年）六月六日作”的年款。

唐代是福建石刻的萌芽时